

被誉为“逸响伟辞，卓绝一世”的屈原作品，千百年来众口赞颂，衣被百代，影响深巨，不仅起而效尤者有之，且研究评论者历代不乏。然而，屈原作品究应何称？却迄今莫衷一是：有曰屈赋者，有曰楚辞者，有曰屈骚者。

究竟应冠以屈原作品什么名称，才能恰如其分、名符其实？似不可不辨。

先看屈赋一称。赋是什么？一般来说，讲到赋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两个概念：其一，作为“诗六义”之一的赋，它属于“诗”的艺术手法之一，朱熹《诗集传》曰：“赋者，敷陈其事，而直言之也”。可谓的论；其二，乃是文体之一种，系由诗发展而来，至汉代达到兴盛。对“屈赋”名称而言，恐怕上述两者均有瓜葛，然更多的则牵涉到后者。

班固《两都赋序》曰：“赋者，古诗之也”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曰：“然赋也者，受命于诗人，拓宇于楚辞也。于是荀况《礼》《智》，宋玉《风》《钓》；号，与诗画境；六义附庸，蔚成大爱锡名国。逐客主以首引，极声貌以穷义；斯盖别诗之原始，命赋之厥初也”章学诚《汉志诗赋第十五》曰：“古之赋家者流，原本诗骚，出入战国诸子。假设问对，《庄》《列》寓言之遣也。恢廓声势，苏张纵横之体也。排比谐隐，韩非《储说》之属也。徵材聚事，《吕览》类辑之义也”。上述说明，赋作为一种文体，乃远源于《诗经》，近源于《楚辞》，产生于荀况、宋玉。可见，屈原作品并不属赋体。

我们从分辨诗（《诗经》）、骚（楚辞）、赋三种文体的差异中，亦可看到屈原作品不属赋体。诗、骚、赋三者，从同属韵文角度言，有其共同之处：均讲究声韵程度不一，有一定的语言节奏，句式上都有各自较为统一、整齐规范。然它们更多的是差异。诗以四言为主，骚一般六言，加“兮”字为七言（也有四言或杂言），赋多为四六言句式；诗、骚基本无散句，极少用联结语，而赋则多联结语和散句；赋比诗、骚少抒情成分，多咏物说理成分，“辅采摛文、体物写志”（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），诗味淡薄，散文气息较浓。刘勰在辨析文体时，很清楚地区于《诠赋》外另立《辨骚》，以区别赋与骚（屈原作品及宋玉等人作品）。任昉《文章缘起》将赋、《离骚》与《反离骚》分为三种文体：赋，楚大夫宋玉所作。

《离骚》，楚屈原所作。反《骚》，汉扬雄所作。”萧统《文选》于赋外，特立幽目，专录楚辞作品（主要是屈原作品）。对于赋骚的区别。明人胡应麟在《诗薮·内编卷一》中有较清晰说明：“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，体裁则大不同：骚无复杂之论，赋整蔚有序；骚以含蓄深婉为尚，赋以夸张宏巨为工。赋盛于楚，衰于汉，而亡于魏。赋盛于汉，衰于魏，而亡于唐。”清人程廷祚的《骚赋论》清楚的辨析了诗、骚、赋三者的异同，声韵之义，诗最先作，至周而体分六义焉，其二曰赋。战国之季，屈原作《离骚》，传称为贤人失志之赋。班孟坚曰：“赋者，古诗之流也。”然则诗也，骚也，赋也，其名异也，义异乎？……故诗者，骚赋之大原也。……既知诗与骚赋之所以同，又当知骚与赋之所以异。诗之体大而该，其用博而能通，是以兼六义而被管弦。骚则长於幽怨之情，而不可以登清庙。赋能体万物之情状，而比兴主义缺焉。盖风、雅、颂之再度而后有《离骚》，骚之体流而成赋。赋也者，体类於骚而又取乎诗者也。……骚之出於诗，犹王者之支庶封建为列侯也。赋之出於骚，犹陈完之育於姜，而因代有其国也。骚之於诗远而近，赋之於骚近而远，骚主於幽深，赋宜於浏亮”。

由此可见，“屈赋”并非赋，实应居于骚——楚辞。然则何以历代均有“屈赋”之称？对此，胡应麟有一番解释，世率称楚骚汉赋，昭明《文选》分骚、赋为二，历代因之，名义既殊，体裁特别。然屈原诸作，当时焉谓之赋。《汉艺文志》所列诗赋一种，凡有六家，千三百一十八篇，而无所谓骚者。首冠屈原赋二十五篇，序称楚屈原离谗忧国，作赋以风，则二十五篇之目，即今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、《天问》、《远游》等作，明矣。所谓《离骚》，自是诸赋一篇之名。太史传原，未举《离骚》而与《哀郢》等篇并列，其义可思。自荀卿、宋玉，指事咏物，别为赋体。杨、马而下，大演波流，屈氏诸作，遂俱系《离骚》为名，实皆赋一体也”。这说明，屈原作品被称为“屈赋”最早可能同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记载有关，《诗赋序》曰：“春秋之后，周道衰坏，聘问歌咏，不行於列国，学诗之士，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。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，皆作赋以风，咸有侧隐古诗之义，其后宋玉唐

勒·汉兴，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，竟为侈丽闳衍之词，没其风谕之义”。《艺文志》的书目上冠一原作品曰：“屈原赋”，于是后代相沿传袭，误称为“屈赋”了。其次，汉代人视辞与赋为相近之文体，认为楚辞即楚赋，用赋声调（“不歌而诵谓之赋”）读楚辞，故该称屈原作品为“屈赋”，这点，连司马迁也不例外，他在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中曰：“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辞而以辞见称。”对此，刘熙载《艺概·辞概》有曰：“古者辞与赋通称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言‘景帝不好辞赋’，《汉书·杨雄传》‘赋莫深於《离骚》，辞莫丽於相如’，则辞亦为赋，赋亦为辞，明甚。”实际上汉代人已知道分别屈原作品与赋作，分称为“诗人之赋”“辞人之赋”（扬雄语），只是没能意识到，既知有别，何必再用此易混淆之名呢？

我们已明白了“屈赋”之称从文体上看，于屈原作品是不恰当的，那么，究竟该称其什么才恰切呢？

楚辞。这是西汉人刘向在编集战国时代楚国诗歌作品时所定的名称，它包括屈原以及宋玉、唐勒、景差等人作品（后王逸、朱熹等将部分汉代模拟屈宋的作品也包括在内）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中对此说道：“至於孝武帝，恢廓道训，使淮南安作《离骚经章句》，则大义粲然。后世雄俊，莫不瞻慕，舒肆妙虑，纡述其词。逮至刘向典校经书，分为十六卷。”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“至成帝时，以

书颇散亡，使谒者陈农，求遗书于天下；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、传、诸子、诗赋……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曰：“哀屈宋诸赋，定名楚辞，自刘向始也”。从屈原为楚人（包括宋玉等人）、屈原作品（及宋玉等人作品）中“皆书楚语、作楚声、记楚地、名桂物”（黄伯思《翼骚序》）来看，冠以楚辞之名应该说是名符其实的；这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屈宋作品是楚文化的代表，是继承楚民歌传统而产生的产物，能表明楚在战国时代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。（刘向之前，已出现“楚辞”名称，见《史记张汤传》）。但是，从严格的意义上讲，以“楚辞”称屈原作品，未免在概念上宽泛了，两者不能完全相符，因为“楚辞”中尚包括宋玉等人作品（及部分汉人作品）。可以说，屈原作品是楚辞的主要部分，是楚辞的代表，却不能说楚辞即屈原作品。

鉴于此，笔者认为，要给屈原作品下比较符合实际的简称，以屈骚为好。其理由是：一、屈原作品中以《离骚》为核心代表作，它是屈原所有作品中成就最高、流传最广、且是屈原的心声与人格象征；二、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创立了一种独特的诗歌体裁，它有别于前代与后代的任何一种韵文，人们习惯地称其为“骚体”（即楚辞），它具有自身独备的诗体语言、句式与风格；三称“屈骚”，既能很清楚地区别于它这种文体（尤其赋），又可与宋玉等人作品不相混淆，令人一目了然。

妄言臆测，未知读者以为然否？

关于《丁玲著作年表》的通信与补正

唐鸿楛

一九八〇年秋，我把自己所作的丁玲著作编目与袁君的《丁玲著作年表》作了比较对照，补勘了我编目中的错漏，也发现了《年表》中的错漏。于后，我整理了一篇“补正稿”，随信寄给了丁玲同志，请求她的帮助。去信如下：

丁玲同志：

《新文学史料》1980年3期上，有经您审阅的袁良骏同志的《丁玲著作年表》一篇，读后甚感欣慰，它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不过，在把它与我所收集、整理成的《丁玲著作编目对照》之中，发现有若干错漏，有的错漏我有把握补正，有的则不能贸然肯定。现有二点，求请指教：

①载1932年《北斗》上的小说《多事之秋》，共发表了十二节，以后《北斗》被迫停刊，没能见到后文，不知您是否将它写完？

②短篇《压榨的心》，袁良骏同志的《年表》云“写于1938年”。查1950年8月三联书店出版的短篇集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，则注明该篇作于1936年。三联的这个集子中有您的一篇校后记，《年表》您也过目过，不知两个日期何者可靠？我这样推想：三联这个集子您是校对过的，校后记是您自己写的，是距写作《压榨的心》的年代近，从记忆角度考虑，它当更可靠些。我这样理解，未知妥否？

随信附呈“补正”稿一篇，请审。

祈复

即请

久安

唐鸿楛

1980. 10. 14

我原以为，丁玲同志年事已高，且体弱有病，又忙于写作及其它事务，怕不一定有下文。谁料，